

追光文学巨匠

纪念萧红诞辰110周年

一个作家的写作与他(她)的身世经历关系紧密,而一个杰出作家人与文的契合度似乎更甚。许多时候,它们甚至可以相互印证、互为解读。作家萧红和她的作品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。

以“悄吟”为笔名,展现出孔武有力的文学世界

萧红之所以能够被称为杰出作家,在于她实践着时代对作家的“立言”要求。她两次到北京求学,思想上深受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熏陶。与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不同,她有着强烈的女性自觉和强劲的生命意识。

这种生命意识内涵宽广,来源于一种对生命平等的珍视之心。这里的平等,不仅有大时代文学所表达的男女平等,而且有为身为知识女性与未曾受过教育的穷苦女性的平等。正是这样的平民立场,使其文学展现出不同的面貌。

她的第一部小说《弃儿》写出穷苦女性的悲苦处境,同时也写出一个她却以往种种纠葛,已经觉醒女性的刚毅和勇猛。萧红发表作品时用的是笔名“悄吟”,但《弃儿》的力度有着一种义无反顾的决绝,其中包含着对一个作家对大时代的呼吁。

如果萧红只是一个专注于自身经验的作家,那么她会是另一个萧红。萧红的了不起之处在于,她的视野从来是由己及人,看到的不是自己从旧家庭中走出来的阵痛与叛逆,以及为之付出的痛苦与艰辛。她看到的还有更广阔世界中的女性,她们没有反抗,逆来顺受,但她们的种种忍耐与屈辱也并不能换来安稳与幸福。

《王阿嫂的死》写的是王阿嫂丈夫被张地主逼疯烧死,而自己也张地主踢打,以致在产后死去,新生儿也未能活成,养女又成为孤儿的故事。小说中,王阿嫂最大的抗争也只能是“哭”与“死”,她哭已死的丈夫,哭自己已死的心。萧红的平民视角显而易见,小说中对人性恶的揭示是有力的,并且通过文学性的书写呈现出来。

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以来的革命文学中的反封建主题,对于萧红而言,是从实践和体验中来的,而不只是从书本和理论中来。这使得萧红文学作品的平民视角与女性觉醒交错在一起。她写的穷苦人也是她自己,因有深刻的体验,所以她的文字虽以“悄吟”这个名字“代言”,却孔武有力。她是真如鲁迅所言“将自己也烧进去”的作家。萧红在平民与女性的身份和命运的双重关注中,将自己的文学打上不独属于自我天地的时代烙印。

读完《呼兰河传》,再回想起小学课本中的《火烧云》,突然有种蓦然回首不敢相认的感觉——那篇将晚霞写得如此灵动的课文,竟然出自这本骨子里透着荒凉的著作。它犹如战争废墟中残存的小花园,在欣赏美丽的同时,又让人不忍。当我掩卷提笔想写点什么的时候,突然有种无力感,因为习惯了萧红那种轻盈抒情、举重若轻的文字风格,不自觉地想要效仿,却发现有多么的困难。

这部作品被定义为回忆式长篇小说,与其说萧红在刻意构思小说情节,倒不如说她是将记忆中的人、景、事,以她喜欢的组合方式,在笔尖自然地流淌出来。这部作品的诞生,是机缘巧合的很多因素促成的。那时候的萧红不到30岁,但已

萧红：生死场上的勇敢跋涉者

何向阳



萧红 资料图片

以勇猛、怒吼式的文学,发出一位作家的呐喊

一个作家不可能也不可以游离于他(她)的时代。1931年的“九一八”事变,日本人侵,东北沦陷,萧红的出走与流离失所,除却她个人反封建、争自由的因素外,她的命运还裹挟着一个更大的家国背景,这就1934年与萧军一起从哈尔滨到青岛之后,萧红创作完成的《生死场》的心理起因。

《生死场》何以在家国破碎的年代里,如鲁迅所言,给人以“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”?原因在于作品本身的品质与气度。

《生死场》从一只山羊、一个小孩子、一个跌步的农夫、一片菜园写起,以十七节文字,绘出20世纪30年代初东北农民生活的图景。作品的镜头剪辑得很碎,没有特别主要的人物或贯穿始终的故事,却保持着生活原有的真实。这种散漫的写法,使得小说呈现出无主角但场景明晰、无情节但细节动人的特点。如果只是狭义地将它视为对普

通人日常生活的铺陈书写,就低估了他(她)的时代。《生死场》所提供的意义更为丰富。比如,从十一节开始,作品写到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百姓的蹂躏,更写出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着“有血气的人”。老三这三个曾经浑浑噩噩过日子的醒来了,他和大家一起流着泪,“在红蜡烛前用力敲了桌子两下”,表达着自己的信念:“我是中国人!……我要中国旗子,我不当亡国奴,生是中国人,死是中国鬼……不……不是亡……亡国奴……”

萧红之所以是萧红,在于在那个家国破碎的时代,作为从东北逃亡出来的作家,没有停留于对个人遭遇的控诉和对女性弱者形象的描摹,而是以一种勇猛、怒吼式的文学,向世界发出一位作家的呐喊。

离开家乡越远,萧红的故园之思越重,并且与故园之失纠缠在一起。她在以“生”“死”命名的小说中,借笔下人物呐喊出的“不当亡国奴”,激荡起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心声,让我们至今热血沸腾,原因在哪里?在于一位饱经沧桑、居无定所的作家对民族尊严的守护和对生命力量的礼敬。

21世纪之初我到青岛,专门找到萧红、萧军1934年住过的旧址——观象一路1号。走上石阶,门上落锁,无缘进入。他们在这里只住了不足半年时间,却分别写出了《生死场》《八月的乡村》。我长久地站立在那个门口,我要让自己记住,就是在这里,就是在青岛,在那个飘摇不定、风雨如磐的岁月,白纸黑字,萧红替家乡农民老赵三发出“不当亡国奴”的呐喊。萧红了不起。那年,她23岁。



20世纪30年代,萧红(右)、萧军(中)、黄源在上海万民照相馆合影。 资料图片

光的回响

对故乡的爱,自然流淌

——读《呼兰河传》有感

计茗馨

经他经人生起落。她辗转居于香港,倍感孤寂,自然会思念故土的旧时光。而且,萧红那时还未患病,更不会想到两年后溘然长逝,因此她当时笔下的这些回忆并非是将行将离别的灰色。至于她是否想要表达批判性,全在于读者和后人的评判。但我认为,对家乡、祖父的爱和思念似乎要盖过批判。毕竟,呼兰河是她的家乡——家乡是一个只允许自己说不好,但不允许别人说不好的

的生命力都很强,努力地活着。但真有什么不幸的事情降落在他们身上,尽管可能会挣扎几下子,但最终逝去也就这样了,就如同溺水一般,扑棱几下后也便悄然沉入水底,水面上无声无息。呼兰河的人都很认命,尤其是女人,由不得她们自己做主,从婚配到婚后的生活,皆是如此。“这都是你的命,你好好地耐着吧!”书中,最具有悲剧色彩的,当属那个“黑

以鲁迅为精神偶像,力图写出《阿Q正传》《孔乙己》之类的篇章

从文学创作的本质上来说,萧红是贴近鲁迅的。这种“衣钵”传承,可以从她的文学实践中看出。1940年1月,她在香港完成了两年前就开始写作的《呼兰河传》。她在对儿时故乡的回望之中,回归了与《生死场》中救亡主题同等重要的启蒙主题。

《呼兰河传》也是散点化透视,没有结构主线,没有中心故事,也没有主角人物,而是日常生活场景的铺陈与百姓命运的延展跌宕,有的是北方小城里关起门来过日子的居民,还有围绕这小城的一些外来过计生的人们,卖豆芽菜的、卖麻花的、卖凉粉的、卖瓦盆的、卖豆腐的,还有看火烧云的。总之日子像河水一般平稳。

在这些“卑琐平凡的实际生活”之外,还有诸如跳大神、放河灯、唱野台子戏、逛四月十八娘娘庙会等等“盛举”,特别是祖父与“我”共同拥有的后园,是一个孩子的自由世界。这里有蜻蜓、蚂蚱、蝴蝶,有樱桃树、玫瑰,有“蒿草当中开了的蓼花”。

但与这些景象在同一时空中的,还生活着小团圆媳妇,还有冯歪嘴子一家。这两个章节体现着萧红的文学启蒙思想。小团圆媳妇嫁到老胡家才12岁,亲人的残酷与看客的冷漠,联合“谋杀”了一个鲜活的生命。和鲁迅一样,萧红批判了这样的精神麻木。

冯歪嘴子一家让人看到希望。女人死后,留下一大一小两个孩子,小的刚刚出生,冯歪嘴子在别人绝望或是看热闹的环境中,反而镇定下来,“他觉得在这世界上,他一定要生根的。要长得牢牢的。他不管他自己有这份能力没有,他看着别人也都是这样做的,他觉得他也应该这样做”。

萧红的笔端留下一抹亮色:“大的孩子会拉着小驴到井边上去饮水了。小的会笑了,会拍手了,会摇头了。给他东西吃,他会伸手来拿。”而且小牙也长出来了。”这样的句子,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中华儿女的坚韧与强悍。在对故乡的一份记忆中,萧红对养育她的祖父表达爱意的同时,也给了她自己曾经在离乱中失去的两个孩子以文学的鲜活生命。

在1941年的香港,萧红写下《呼兰河传》《小城三月》《马伯乐》这些启蒙主题作品的同时,仍写下不少关于救亡主题的篇章。在《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》中,她传达出“在最后的斗争里,谁打得最沉着,谁就会得胜”的必胜决心。在《“九一八”致弟弟书》中,她对青年表达自己的信心,“你们都是年青的,都是北方的粗直的青年。内心充满了力量,……你们都怀着万分的勇敢,只有向前,没有回头。……中国有你们,中国是不会亡的。”这与她写于1938年的《黄河》《汾河的圆月》《寄东北流亡者》等作品相呼应,显现出一位作家与时代和民族的密切关系。尤其是《黄河》的结尾,对于“我问你,是不是中国这回打胜仗,老百姓就得日子过啦”的百姓之问,八路军兵士回答是:“是的,我们这回必胜……老百姓一定有好日子过的。”

从呼兰县出发,从哈尔滨到北京、青岛、上海再到东京,从北京到上海再到临汾、西安、武汉、重庆,直至香港,萧红一生是在漂泊中度过。我们从《商市街》中即可了解她所经历的一无所有和饥寒交迫,但无论在哪里,无论是迁徙、离乱、饥饿、病痛,她都始终抱定这一信念。这是胜利的信念,也是对人的信念。与这信念一起让我颇感折磨

的,还有萧红文学风格的自由。当时多位评论家对她小说的散文化风格有着不同看法,萧红并不辩论,只是在与聂绀弩的一次谈话中说:“有一种小说学,小说有一定的写法,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,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。我不相信这一套,有各式各样的作者,有各式各样的小说。若说一定要怎样才算小说,鲁迅的小说有些就不是小说,如《头发的故事》《一件小事》《鸭的喜剧》等等。”聂绀弩追问:“写《头发的故事》《一件小事》之类吗?”萧红的回答相当率真:“写《阿Q正传》《孔乙己》之类!而且至少在长度上超过他!”这显现出萧红的超越之心。她她的确试图在写作中加以践行。

茅盾曾在1946年《呼兰河传》的再版序中写道:“要点不在《呼兰河传》不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,而在它于这‘不像’之外,还有些什么东西——一些比‘像’一部小说更为‘诱人’的东西;它是一篇叙事诗,一幅多彩的风土画,一串凄婉的歌谣。”这种评判是公允的,但我不同意文中隐约有在对萧红与大时代隔绝的判断。的确,萧红是寂寞的。这寂寞的由来,并非感情上的一再受伤,或是对居无定所的厌倦,而是她在精神上一直是一个人的,一直与她所在的知识界保持一定的距离,以便于她进行观察和审视。

在最后的岁月,她一边体味这寂寞,一边仍在拼命写作,她真正体味到了“两间余一卒,荷戟独彷徨”的滋味,这可能也是她写下“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,留得那半部《红楼梦》给别人写了”的身先死的“不甘”,这可能就是她死后想葬在鲁迅先生墓旁的原因吧。

萧红去世时不足31岁。自1932年写诗开始,到1942年1月,不足十年时间,她写下了百万字的作品,而且还是在颠沛流离、贫病交加之中!这些作品,是她个人艰辛生活的见证,也是那个时代的人对于国家、民族、人的精神的一份思想的贡献。这思想,是她于生死场上跋涉而来的。

萧红不朽!
(作者系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任)



《生死场》一九三五年版



《呼兰河传》一九四一年版

萧红足迹

《光明日报》上的

●1981年7月7日,刊发李路、洪治的文章《写在〈萧红选集〉出版的时候》,文章指出,虽然由于生活的磨难,萧红还没有能够成长为一个很成熟的作家,就过早地夭折了。但是,她在不满十年的创作生涯中,在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,所取得的成就,却仍然是十分可贵的。

●1992年11月28日,刊发报道《再访萧红故居》,报道指出,故居的主体为五间正房,青砖青瓦,大红窗棂,新得使我无法和记忆中的断壁叠合在一起。屋前那棵死了的老榆树彻底不存在了。离它的“遗址”不远,花坛中塑了一尊萧红全身坐像。身着长衫的她,右臂支住下颚,左手持一本书,若有所思。不断有人前来与她合影,喧闹声取代了往日的冷寂。正房东屋外间有一张北方典型的火炕,1911年萧红就出生于此。炕上有她童年时藏用过的书箱,里面有她去哈尔滨使用过的牛皮面皮箱等十余件遗物……萧红因有呼兰而成长,呼兰因有萧红而自豪。

●2000年3月20日,刊发程树榛的文章《还萧红与萧军本来面目——简评秋石对“文坛二萧”的研究》,文章指出,在《萧红与萧军》一书描写到萧红临终的情景时,作者直截了当地引用了萧红所倾吐的心声:“如果三郎在重庆,我给他拍电报,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!”这轻轻的一笔,使我们看到了萧红对萧军的一往情深,从而使得那些不负责任的种种猜测不攻自破。

●2011年9月6日,刊发报道《新版〈萧红全集〉首发》,报道指出,新版《萧红全集》按照作者生前结集的时间顺序编排,基本上反映了原书原貌,并将作者未结集和未发表的作品进行了详细整理,同时附有作者年表、索引和大量珍贵照片等。

●2012年1月9日,刊发于文秀的文章《萧红:命薄如花 流芳百年》,文章指出,萧红作品的魅力,不仅限于对故乡记忆的引人入胜的灵动描述,还在于它们的文化启蒙意义,和鲁迅一样写到了灵魂深处。她笔下的人物不仅物质生存极度匮乏,而且精神与心灵世界亦是荒芜、萧索的,绝少意义之光的烛照。

●2015年5月7日,刊发刘勇的文章《今天为什么再读萧红》,文章指出,如今,“萧红”频频出现在电影、话剧之中,原因在于两个方面:其一则是萧红人生的传奇性与悲剧性,其二则是萧红作品所具有的经典意义……对于我们而言,不应只了解她的故事,更不只是了解那些所谓的爱情故事,对徐志摩、郁达夫等也是如此,归根到底,他们是以诗才闻名,以文才闻名。

●2021年1月16日,刊发迟子建文章《艺术的淬炼正如从童话到神话》。她写道,当自己小心翼翼展开萧红于1936年12月18日在东京写给萧军的信时,仿佛听见了萧红的心跳声,看见了她乌黑闪亮的大眼睛,听见了笔在纸页上行走时那落雪般的声音,感受到了她的柔情、孤寂和怅惘。萧红走得早,但她以作品的强大生命力一直灿烂地活着,《生死场》和《呼兰河传》,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永恒的经典。

我并无强烈感受,直到团圆媳妇被虐而死和众人的无动于衷,那种荒凉感才真正袭上心头。我也能理解真实世界中的萧红,会在其最牵挂和依恋的祖父去世后,不顾家人反对而出走。当时的她,应该是想逃离呼兰河的。只是远在香港的她,又想起了家乡。她以这样的方式,表达着对故乡的爱,对家乡人的怜悯与思念。

书中描写的是1920年前后的呼兰河,是旧中国的缩影。今天,我们都过上了小康生活。我的老家在大湖流域,如果今后我跟萧红一样回忆故乡,我笔下的大湖和她笔下的呼兰河,面貌从内到外应该完全不一样吧。

(作者系上海市梅陇中学初二1班学生)